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之下私企成為國家冠軍私企的過程分析：阿里巴巴個案研究

鄭 家 琪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分析私有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級國企的合作如何轉變中央政府政策，使私有企業成為國家冠軍私企。彼此在合作過程中，產生不同類型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變遷。以阿里巴巴為個案，研究顯示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出現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息息相關，在電子商務監管體系不足的狀況之下，提供了國家冠軍私企對制度環境的解釋空間，以及地方政府偏差選擇行為的空間，進而使私企與地方政府產生共享利益的合作。私企與政府合作的整體過程，從「層化」的制度變遷類型朝向「轉化」類型，亦即從擴大市場占有率，並且取得與國有企業相當資源，擁有改變既有制度的解釋能力，超越國企成為國家冠軍私企。

關鍵詞：中國大陸、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企關係、阿里巴巴

* * *

壹、前言

2014年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公布中國500強名單，前100名僅9家為私企，^①雖然數量很少，但在各自領域中擁有優勢主導或寡占的地位。例如2015年華為以13.57%的市占率，成為中國市場銷量第1名。此外，根據2014年

註① 行業類型包括零售、電腦設備、紡織、通信電子設備、有色金屬冶煉、黑色金屬冶煉、批發、房地產、汽車。

PCT 國際專利申請統計，華為以 3,442 件成爲當年最大專利申請者，而國有控股的中興通訊則以 2,179 件專利申請量位列第 3（WIPO 2015）。阿里巴巴是另外一個很好的案例，旗下的淘寶網擁有近 95% 的 C2C 線上銷售市占率（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2016）。如阿里巴巴這樣的國家冠軍企業，^②在國有企業林立的中國市場更顯獨特，是以本文藉由阿里巴巴發展過程探討：爲什麼國家冠軍私企出現在對私企不利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

關於中國私營企業在市場角色的研究，既有文獻存在著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將中國私企區分爲草根企業與政府相關企業，前者在國內市場遭遇不利的經營環境，而後者往往只是協助國有企業的角色（Dickson 2008；Bai, Hsieh and Song 2014）。第二種觀點認爲中國私企並非像第一種觀點的備受壓抑，相反地，是相當活躍的，而動力來自非正式制度，譬如非正式金融制度、非正式社會網絡（Huang 2003；Tsai 2006）。然而，無論是那種觀點均強調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環境對中國私企的不利，卻無法解釋國家冠軍私企（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爲何出現。本文主張國家冠軍私企的出現係因私企比國企提供更多利益給政府機構，是以政府機構選擇與私企合作，而彼此間合作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彌補了既有制度的不足或產生制度創新的結果。

Ian Bremmer 認爲國家冠軍私企是公司維持在私人手中（儘管政府有時持有少數投資）卻依賴著政府積極的物質支援，並用以發展國內的支配地位和出口市場。企業經由承包政府合約來維繫利益，他們擁有管道來獲得國有銀行的廉價貸款，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減免（Bremmer 2010, 67）。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之下，國家直接作爲市場結構的一員，享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以及選擇國家冠軍企業的權力，而這些國家冠軍企業不僅僅是確保市場競爭力，還具備發展整體經濟、提升政府聲望或政治利益等作用（Thatcher 2014, 10）。Shaun Breslin（2010, 21）進一步說明中國政府強力支持名義上的國家冠軍私企，例如華為，係因中國領導人藉由這些國家冠軍私企改善中國的全球經濟形象。

隨著國內市場化改革與外部全球市場的壓力，中國共產黨不斷地開放私部門的

註② 國家冠軍企業之概念請詳見後述。2013 年 1 月，《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座談會上，溫家寶指名馬雲爲電子商務戰略提供建議（張旭東、劉錚 2013），並於同年 11 月，在題名爲「夢想在召喚 改革再揚帆」的官方文宣之中，示明馬雲是電子商務的領軍者、改革的開拓者（張宿堂等人 2013），馬雲被視爲民族企業家。2014 年，阿里巴巴參與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學習研討班（張洋、張瀟月 2014），足見阿里巴巴作爲民族企業的重要性，馬雲亦在央視《對話》節目中，明確表示阿里巴巴作爲國家企業的定位（慶勝春 2014）。

發展空間。雖然分析中國私部門發展研究的文獻衆多，卻鮮少探討私企如何與國企競爭並獲得成功的經驗。根據前述 Bremmer (2010) 的定義，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包含華爲、百度、阿里巴巴、聯想等私企，這些企業均爲政府所關注的策略性產業，在成爲國內龍頭企業之前，這些企業尋求地級政府的合作，再向上發展到與中央級別機構合作。^③本文以阿里巴巴作爲代表性個案，^④電子商務是國家策略性產業的一環，無論是內部電子商務監管制度的變化，或是外部環境衝擊如 IT 泡沫、加入 WTO，這些變遷因素影響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阿里巴巴成爲國家冠軍私企過程足以體現行動者合作所產生的制度變化。

本文的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府與私部門關係的相關文獻。第三節是從歷史制度主義關於制度變遷的論點探討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如何影響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變遷。第四節是個案分析，分別就誠信通、螞蟻金服分析電子商務制度層化與轉化的形成過程。而第五節爲結論，總結歸納個案制度變遷發生的原因，並且提供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補充。

貳、文獻回顧

目前對於中國私部門的研究文獻，可以區分爲以下部分：(1) 從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角度，分析私部門的市場角色與作用。(2) 從歷史脈絡分析政府與私部門之間的關係，並且探討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政治社會制度之下的私企活動。然而，這些學術論著強調中國的制度環境不利於私部門發展，卻無法說明國家冠軍私企爲何能存活及茁壯。

一、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係指中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不斷地向國有企業注入資金，並且進行企業重組，逐漸形成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這樣的共生關係是爲了確保國有企業的生存，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 (Pearson 2015)。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處於 Aldo Musacchio 和 Sérgio G. Lazzarini (2014, 5)

註③ 百度部分，參見李永進 (2013)；聯想部分，參見凌志軍 (2005, 216)；三一重工部分，參見盧凱旋 (2003, 258) 和國務院生產委員會 (2003, 341)。

註④ 相較於其他中國國家冠軍私企，阿里巴巴初創時期的政商關係較少，卻具有明顯幾近於獨占的市場地位。爲強調非正式制度的影響，而非聚焦於關係，是以選擇阿里巴巴作爲代表性個案。

所定義的「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Leviathan as a majority investor）的階段。

Bremmer（2008, 134-145）認為中國、俄國等威權體制國家更有利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是：中國以確保共產黨持續執政作為最高原則，為此目的就必須維持經濟穩定，並且不斷地創造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存在於國際與國內市場，政府官僚制定新的規則與監管，用以確保國企或本土私企在國內市場優於外國競爭對手。「中國的資本主義」（Sino-Capitalism）的關係網絡特徵是政治和經濟菁英彼此合作，進而形成自下而上的二元性混和系統，一是政府控制了金融並且指揮著頂層工業，另一是具有競爭力的零售和製造業私有企業／混合型企業（包括外商和本土企業），這兩種系統不斷地累積資本，相互並存卻也相互獨立（McNally 2012）。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藉由不斷翻新對經濟政策的控制以及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黨統治的合法性（McNally 2013）。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除了政府大力支持國有企業，同時也會資助中央重視的私有企業，中國政府協助本國企業的方式包括國有銀行和主權基金的貸款、政府與他國的經濟協議、外交政策的金融資助和訊息傳播，但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在國際投資方面沒有一定模式可循，係因地方政府在開展海外市場時，未必依循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多是經濟利益優於政策（Gu, Zhang, Vaz and Mukwereza 2016）。綜言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符合了國家資本主義運用政府資源挹注目標企業的特徵，同時補充國家對企業的干預方式，以及共產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特殊性。然而，國家冠軍私企出現諸多違反政府所期待的市場行為，目前研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學者卻鮮少討論該部分。

二、公、私部門的發展空間演變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對國企和私企的影響有所差異，政府對國企的扶助並未改變，只是協助方式的變化，相對之下，私企的發展空間與政府對私企的協助則是隨著整體制度環境而改變。

（一）1979年～1994年：帶著「企業加入黨」

1980年代，中央政府集中管理國有企業，以直接撥付預算的方式資助國企的發展。當時市場實施價格雙軌制，在國有企業囊括所有產業範圍的狀況下，國企被賦予完成特定計畫的任務（Naughton 2007, 92），卻也衍生出「倒爺」的問題。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個體戶（包括私有企業）則是帶「紅帽子」的方式備受限制。

1979年到1993年之間，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特徵是權力放散，工業部分開

放讓非公有經濟體進入，此時包括鄉鎮企業、私企或外資企業迅速進入各種工業（Naughton 2007, 90），1990年代江澤民提倡企業家入黨（趙建民、張執中 2005, 314-317），增加企業家的政治資本（Li, Meng, Wang and Zhou 2008），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提升了私企的市場地位。

（二）1995年～2003年：抓大放下的私企興起

1995年到2003年之間朱鎔基主導一系列的國企及金融改革，隨著國企利潤占國內生產總值下滑，1995年朱鎔基推出「抓大放小」政策（Li and Brødsgaard 2013, 57），給予地方政府處置虧損中小國企的權限，如收購、兼併、私有化等。並且允許私企購買這些國企，而此舉增加了地方政府與私企的話語權（Mattlin 2007, 8）。

1997年後中國進行一系列銀行體系改革，政府資助國企的方式轉爲銀行信貸，至此，信貸成爲國企投資能力的決定性因素（Naughton 2007, 305-308）。此外，國企配合企業治理改革，附隨著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國企增加其他募資渠道，惟政府仍掌握多數非流通股（錢衛清 2004, 67；何佳 2007, 13）。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私企發揮了吸納大量下崗工人的作用（吳敬璉 2010, 168-169），遂以中央政府推動一系列有利於私企的政策措施，包括各省銀行執行中小企業的政策性信貸、減免稅賦及行政規費等。^⑤1999年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提升私企的地位，並且保障私企的合法權利，私部門崛起是政策創造公平競賽的結果。

（三）2004年迄今：私企進入策略性產業

這段期間中國經濟改革依重於私部門快速增長，2005年和2010年的新舊版「非公36條」顯示政府放寬私企融資管道，政府一方面主導著頂層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協助私企發展新興戰略產業，雖然開放大部分產業允許私企進入，但是設下諸多市場准入限制（馮興元 2012）。

國企因應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混和制改革，在關鍵產業中形成集團（劉孟俊、鍾富國 2013）。另外，國企配合政府「走出去」政策，從政策性銀行的產業投資基金取得資金與信貸，大規模進行海外投資（於曉、矯磊 2011）。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將資源集中目標國企，私企是在剩餘資源的條件下發展。然而，國企

註⑤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8）。

與私企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並非私企協助國企。^⑥

三、政府與私部門的關係

關於政府與私部門關係的文獻包含結構限制與行動者自主兩類論點。結構限制論聚焦在中國共產黨對私部門的控制；行動者自主論則分析權力結構的系統，對與政府與私部門的關係，提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套截然不同觀點的探討。

以結構限制觀察中國的政府與私部門關係，Bruce J. Dickson (2008, 19-26) 認為中國的裙帶共產主義 (crony communism) 是共生型態，它建立在黨、政府部門和資本家的共同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策略有兩種。第一，策略性同化 (co-optation) 的結合，受中國共產黨同化的私企企業主是經濟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第二，中國共產黨創造新協會，而這些協會形成一種中國共產黨的細胞式網絡，用以適應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動，藉此同化和整合不斷地增長經濟菁英。然而，Dickson 偏重於自上而下的單向詮釋，卻忽略私企的自主性。Yasheng Huang (2003, 122-129) 主張中國大陸市場競爭環境是受政策影響而非市場機制，中國企業內部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啄食順序，犧牲具有經濟效率的私部門換取較不具效率的國有部門的生存空間。中國政府對擁有技術和創新的私部門，欠缺政治合法性、法律保障，並且存在著融資問題 (Huang 2008, 292)。

有別於 Dickson 對自上而下的行業協會研究，Victor Nee 和 Sonja Opper (2014) 針對被政府排擠的私有企業進行研究，發現這些企業另成立非正式協會，遵守協會規定並取得融資。他們主張資本經濟制度棲息於自下而上的企業行為，非正式經濟制度引導、激勵著中國新興資本經濟體系。Kellee S. Tsai (2005, 1136-1145) 認為私營企業主與幹部之間，存在著「共生侍從主義」 (symbiotic clientelism) 的關係，幹部提供企業保護和優惠，並且從提供服務來收取物質利益。在驗證中 Tsai 發現只有在私營企業主同時具有能力和渴望時，才能運用非民主的方式捍衛自身利益。但是，Tsai 對企業主的分析屬於靜態，無法解釋隨著企業發展過程所改變的能力和渴望。Chihshian Liou (2013) 則認為黨、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是巧妙的制度設計，財產權再分配創造了目的性模糊和良好的公司激勵結構。

以行動者自主性探討政府與私部門關係，Huang (2008, 4-6) 從制度外的企業行為分析，指出合資公司成功的原因是公司經理人和所有者雖然都是中國人，但是

註⑥ 2015 年華為和中興相互展開專利戰。

公司的法人資格是外資企業，而這些公司結合中國經營和外商法律地位的獨特特徵。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不只是允許外國企業進入，也允許中國企業走出去，香港就像是優秀中國企業的安全港灣，替代中國不健全的金融和法律制度。然而，Huang 的研究只適用於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特區時期，雖然本土企業擁有外資身分而享有優惠政策，在實際經營行為中，還是面臨到中國各地方規範不一致的問題。Kellee Tsai 和 Xiaoxiao Shen (2016) 從制度適應能力 (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 分析政企關係，各地方政府處理世界經濟危機時，因為各自過往發展的經驗形成路徑依賴，進而成為制度適應能力的關鍵因素，地方政府領導人的積極性、對新政策思維開放性和政策活用性都會影響處理經濟危機的成效，產生出不同的政企關係模式。

參、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歷史制度主義分析

以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本文借助制度變遷的相關概念用於分析國家冠軍私企出現的動態面向。首先將聚焦於行動者的行動邏輯，尤其是說明政府為何改變合作對象。不同於過往歷史制度主義的相關文獻從路徑依賴分析中國私部門的發展，並以層化方式來解釋政府與私企之間的關係。其後將探討外部衝擊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變化，並且釐清中國國家冠軍私企轉化既有制度的具體內涵，亦即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如何改變政治啄食順序。

一、歷史制度主義

制度變遷區分為「層化」(layer) 和「轉化」(conversion) 兩種制度變遷的類型。「層化」係指制度環境涵蓋著不同制度，這些制度的目標並不一致，而使多層次的制度脈絡限制了特定正式制度。當「層化」的現象發生時，新規則附加在既有規則之上，並且針對既有規則進行修改或增加，進而實質改變既有制度的核心 (Tsai 2006, 121; Mahoney and Thelen 2010, 16)。「制度層化」形成了平行的制度，制度之間的互動造成制度改變，權力不足的行動者採取間接的方式修改既有制度 (Brink 2011, 206)。「轉化」則是行動者重新詮釋既有規則，雖然規則依然維持著，卻以新方式詮釋和回應 (Thelen 2004, 228-230)。在「轉化」的型態中，行動者利用模糊的規則創造制度的「缺口」 (Mahoney and Thelen 2010, 17, 21-22)。

Tsai (2006) 認為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屬於內生性變遷，^⑦Tsai 提供動態制度發生變遷的原因，她主張中國基層監管者容忍著制度扭曲，使得調適性非正式制度取得準合法的地位，進而破壞了正式制度的合法性。以中國電子商務為例，正式制度係指電子商務監管體系，非正式制度則是地方政府與阿里巴巴合作所創造的網路交易系統。

不同於 Tsai (2006) 強調非正式制度迴避正式制度的作用，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變遷過程中，本文認為制度變遷來自於私企與相關政府機構合作，亦即，基層地方政府不是作為他者容忍制度的扭曲，而係作為改變的能動者。私企與地方政府合作所創造的非正式制度具有完成特定政策任務，或是產生制度創新的功能。^⑧若非正式制度具有完成特定政策任務的功能時，非正式制度會以「層化」的型態存在；若非正式制度產生制度創新時，則會形成「轉化」的型態。以阿里巴巴的誠信通為例，與地方政府、國有銀行地方分行合作的企業信評系統，以「層化」方式改善網路交易安全過程。^⑨又如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網路金融個人信評系統彌補國有銀行信用系統的不足時，阿里巴巴與中國投融資擔保公司的合作並以「轉化」方式改變國企優先的權力結構。

再者，行動者依據成本、利益和風險來決定合作與否 (North 1990, 25)，合作的成立除了需要各自的偏好資訊之外，還需要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偏好與策略 (Schofield 1985, 12-13)。合作的成本取決於共享利益之下合作可能造成的機會成本 (Hall 2010, 210)，而合作的共識源自特定行動所帶來的好處 (Hall and Thelen 2009, 13)。Tsai (2006, 123) 發現地方政府與普通行動者合作的發生在以下幾種情境：(1) 不同的正式機構具有相互衝突的任務；(2) 政策實施相對分散；(3) 地方官員在某一特定政策領域與當地公民具有趨同利益 (例如，促進地方經濟增長、隱藏來自更高級別政府的收入、保護地方產業、扭曲規則吸引外部投資等等)。

註⑦ 新制度主義論者 Amos Zehavi (2012, 736) 主張內生性變遷來自於決策者錯誤或過度的回應，錯誤的累積改變既有制度的平衡。

註⑧ 制度創新的需求來自於既有制度的侷限提高了資源分配不均，這些需求可藉由產權新型態的發展、更有效的市場制度來解決，而制度創新能夠有效達成社會共識 (Ruttan and Hayami 1984, 3-4)。制度創新具有新穎、工具及合法等特質，有助於調適組織 (Raffaelli and Glynn 2015)。制度創新能使組織重新建構自身，進行擴散式學習，並且在其他層次創造更豐富的創新活動 (Hagel and Brown 2013)。

註⑨ Sweeney 和 McFarlin (2014, 13) 亦持有相同看法，其認為地方政府鼓勵創新，並且中央政府希望本土企業發展成為馳名品牌，由於中國地區差異和法治環境不足，使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在中國市場擁有比外商更多優勢。

以行動者的偏好而言，現實世界裡行動者往往是在資訊不完全的狀況下形塑自身的偏好。是以，在制度無法適時回應外部衝擊的狀況之下，行動者傾向選擇即時性的激勵（Jupille, Mattli and Snidal 2013, 212）。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工具性與務實的制度特徵之下（Tsai and Naughton 2015, 4; Gallagher 2015, 239），本文主張當發生外部環境劇烈變化時，相關政府機構與私企的合作更多具有政策目標的功能，當這樣的合作達到成本相對較低、利益相對較高的結果時，相關政府機構便會改變合作對象。

綜上所述，私企藉由分散的監管政策空間，回應來自內在的經濟改革政策變化或是外在的國外環境變化。在符合地方政府與私企共享利益的前提下，私企尋求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機會，並且透過彼此合作逐漸改變國企優勢資源或市場結構。易言之，私企與地方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有助於私企獲得生產要素，而地方政府會選擇與私企合作而非國企，係因私企可以提供比國企更高的稅收來源（Atherton and Smallbone 2013, 17），以及帶動整個地方其他產業發展。當私企與地方政府的合作越緊密，地方政府越可能改善私企的經營環境，在政策執行時地方政府偏向對私企有利的政策解釋，以產業基地爲例，地方政府對土地出租採取限制競標或強制拆遷等政策行爲。^⑩

二、中國國家冠軍私企

（一）國家冠軍私企的概念

國家冠軍（national champion）係指商業企業被政府挑選出來作爲民族企業，借以提升特定產業裡該國的國際影響力，國家冠軍透過特殊契約快速發展企業，如補貼、市場保護或特定產業政策（Kumar and Steenkamp 2013, 186）。Bremmer（2010, 67）提及國家資本主義包括國有企業、國家冠軍私企等主要行動者，其中，國家冠軍私企是公司維持在私人手中（儘管政府有時持有少數投資），但卻依賴著政府積極的物質支援，並且用以發展國內的支配地位和出口市場，使之具有幾近於獨占的市場地位。以巴西 JBS S.A. 爲例，該公司取得巴西國家開發銀行（The Brazilian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的基金，成爲全球禽肉市場主要企業（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1）。

政府之所以提供物質協助國家冠軍私企，其原因如下：具有技術的重要地

註⑩ 例如 2010 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將後海商務用地售予聯想的招標，參見：時代週報（2016）。

位 (Lambin 2014, 252)、具有就業或退休等社會穩定功能的重要地位 (Vleck 2015)、私企正在發展新項目或有利潤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15-17)，而這些私企存在著融資困難的問題。政府以主權基金、國有企業或開發銀行方式持有私企小部分的股份，促使私企快速成爲新的國家冠軍企業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282)。

吾人認爲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概念有別於國家冠軍 (national champion)，中國政府並非在國家冠軍私企成立之初積極提供物質資源，而是基於自利考量之下，例如維持產業競爭力、提升全球經濟影響力等，選擇符合條件的私企成爲合作對象，並將之培養成國家冠軍私企。再者，基於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和行政責任下放的官僚結構特徵 (周黎安 2008)，分析政府對企業扶持時，應細分爲中央、地方，換言之，中國政府對私企的資助可能發生在不同階段。

(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輔助的對象、方式與效應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環境不利於私部門的發展，促使私企必須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用以確保企業權益 (Kung and Ma 2016)。不像其他國家的冠軍企業可能是國有或私有，中國共產黨爲確保生存而保留對關鍵產業的直接控制，所以絕大多數的國家冠軍企業是國企，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只會出現在非政府完全壟斷產業。

中國政府選擇資助私企的一般性原則是這些私企的營運規模大 (Sauvant, Economou, Gal, Lim and Wilinski 2014, 92)，部分私企屬於輔助上游國企的機能型企業，如吉利 (Pearson 2015, 34-35)。政府期望從國家冠軍私企獲得政治利益並且提升全球經濟地位 (Breslin 2012, 39)，是以，政府提供政府信用狀、契約、補助，或是運用對外投資保險等確保國家冠軍私企的比較優勢。

由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兼具對外和對內的特徵，對內中國政府善用國內民族自豪的輿論幫助私有企業將其外國競爭對手邊緣化，例如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一案 (Bremmer 2010, 140)。中國政府支助國家冠軍私企的優點在於政府資源和跨國私企經營經驗的結合形成了特殊的創業投資，缺點則是政府的補助反而削弱冠軍私企的生產和創新效率 (Njegomir, Rinter and Vrkati 2014, 659)，以吉利汽車爲例，地方政府補貼占總利潤的一半 (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5)。

(三)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政商網絡與政府控制

1. 政商網絡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與其他國家冠軍私企相同的是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從國有銀行獲得資金，如華爲得到國家開發銀行的資助；不同的是中國存在中央、地方兩個層

級，雖然中央級國企獲得財政支持，但是省級國企和國家冠軍私企爭取具體項目商業機會與投資時（Lin 2017, 122），中國私企的補助往往來自地方政府（Milhaupt and Zheng 2016, 195-196）。地方政府、行業協會與國家冠軍私企形成「網絡體系」（networked hierarchy），在「走出去」外交政策之下，地方政府提供商業資訊、培訓和建議給中國企業（Gu et al. 2016）。

在阿里巴巴個案中，政府對國家冠軍私企的協助，不僅僅來自國有銀行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在黨國體制之下，政府擁有市場准入的審核特權或擔保，私企以此排除競爭對手。國家冠軍私企與地方政府的結合，提供私企發展的政策空間，憑藉著這樣的合作成效作為爭取中央級機構合作的機會。

企業家為了建立政治連結而加入共產黨，企業家透過擔任人民大會代表，尋求更多經濟利益和政治安全（王春福 2012），入黨有助於排除潛在的新競爭對手（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4），也可以避免政府官員的非法行為（王芹、朱麗平、朱敏 2016）；另一方面，在黨國體系下，政府連結的行動者（如銀行、國企或監管單位）建立與成功私企的關係，標榜著對黨的忠誠和影響力（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4）。

2. 政府控制

國家冠軍私企受到政府的協助，卻也存在著官員貪污、企業發展停滯等問題（Vleck 2015；Booij and Sahib 2012），例如德國國家郵政營運商（National Postal Operator, NPO），金字塔型市場導致技術落後（Gough 2014）。再者，私企享有的優惠固定資產或自然資源可能存在著被徵收的風險，又或政府追求因契約而生的準租金（quasi-rents），針對合約與私企重新談判。最後，使用企業現金支持政府合約，降低了私企的議價能力（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219）。中國國家冠軍私企比起其他國家冠軍私企受到更多政府的控制，控制的方式包括協會監督企業、主管機關約談企業經理人達到特定政策目標或是鼓勵企業參與國家產業重組（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5-688）。總言之，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具備國家冠軍私企的特徵，但是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體系特色。

肆、阿里巴巴與政府合作分析

中國電子商務監管體系一直落後於電子商務的實際發展，使得私營電商有更多解釋制度規範的機會，依據前述 Tsai（2006）所提策略性空間的概念，中國電子商

務監管制度的缺口，包括：中央—地方監管職權的分散、中央主管機關對產業發展方針的不一致，而這些策略性空間創造出阿里巴巴與其他反對者的合作。

1990 年代中國對於電子商務規範處於起步階段，提供阿里巴巴探索市場及發展商業模式的空間。2000 年科技泡沫衝擊中國電子商務行業市場，阿里巴巴尋求與地方省級、市級政府合作的機會，創設「誠信通」，以「層化」方式加強自身在國內電子商務行業的優勢。2007 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阿里巴巴持續擴大與杭州地方政府合作，並且將合作層級向上延伸至中央級別，當中小企業面臨經營資金困難之時，阿里巴巴創造網路微型金融的全新商業模式—「螞蟻金服」，以「轉化」方式改變既有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市場。

一、制度層化：阿里巴巴誠信通

早期電子商務監管機構之間對政策目標的不一致，創造了地方政府與阿里巴巴合作的策略性空間，誠信通以層化方式，外加在國有銀行的網路支付系統，提供另一套網路交易安全的非正式制度。

（一）電子商務監管初期的制度缺口

早期的電信產業發展是由技術人員所主導，相對於電信部門的市場發展取向，前者更重視於技術的改進（信息化研究部 2009），這兩派對產業發展的目標並不一致，造成兩派正式機構相衝突的任務，限制了 1990 年代電子商務正式制度的發展。^①一，是技術人員主導的 CA 安全認證系統，由信息產業部信息化推進司制定原則規範（宋玲 1999），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所負責執行（趙煥新 1999），他們著重於網路交易安全與技術標準。^②二，是部門所主導的國有網路交易平台，強調電子商務市場發展，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設立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③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建立的「中國商品交易市場」，^④這些項目受益於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的「金關」工程、「金貿」工程。

註① 參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資訊化重點專項規劃》，該文件出現對電信產業是否市場化的矛盾敘述如下，贊成的內文如：「積極發展電子商務，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不贊成的內文如：「避免形式主義、盲目發展和重複建設，不能搞鋪攤子、花架子、形象工程，更不要相互攀比，堅決制止刮『電子風』、『資訊風』」。

註② 如 1997 年的《電腦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

註③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北京電信、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IBM 等合作共組「中國電子商務」，並採用 CA 安全認證系統。

註④ 2003 年後與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合併為商務部。

電子商務政策實施相對分散的狀況下，提供了地方政府調整的機會（Krug and Hendrichske 2008），^⑮創造了阿里巴巴與浙江省政府之間反對者的策略性空間。^⑯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作爲產業方針的領頭羊，一方面，掌控著交易安全規範系統的建立；另一方面，對電商市場發展採取模糊性規範，允許地方政府與企業依據市場機制發展（張秀發、王大順 1999）。在模糊的中央政策之下，地級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擁有實質的解釋權力。不同於中央政策目標，浙江省政府的政策目標是建立支付系統、^⑰物流配送系統，爲此地方政府提供授信貸款、財政減免及基礎設備優惠等誘因給目標企業，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浙江日報 2003）。

（二）阿里巴巴與地級政府的合作

1997 年地方政府面臨大量工人下崗的失業問題，此外，地方政府爲了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全球化進程，在 1997 年到 2003 年這段時期，私部門有較多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發展空間。^⑱

1. 國企競爭對手

浙江省政府原屬意由地級國企發展電子商務，如杭州電信的中國黃頁，地級國企結合地方資源進行兼併，確保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地方政府希望深化產學合作（浙大網新 2002），以地方浙江大學人才結合地方央企發展電子資訊產業，1997 年中國黃頁與與浙大電腦公司合併後成立浙大網新互聯網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大網新）（許揚帆 2003）。另外爲了配合浙江省政府的產業政策以及擴大浙江新網的規模，2001 年進行一系列企業的兼併、重組和相關企業持股增加。浙大網新增加北京曉通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投資和浙大海納快威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人民網 2001）。

註⑮ Krug 和 Hendrichske（2008）主張中央政府爲了讓地方政府執行經濟政策，「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賦予地方政府自主性，地方政府經由與上級機關的契約，或是非正式網絡的協調，獲取「邊際利益」用以發展地方經濟。

註⑯ 2004 年浙江省政府推行「五百億工程」建設基礎設施，旗下的子工程項目「百億信息化建設」主要包括網路基礎建設、電子政務、基礎數據庫和產業信息化改造等，並且根據浙江省信息辦公室發布《關於加快資訊化帶動工業化指導意見的通知》規定，在「十五」期間挑選 100 家資訊化試點企業、30 家資訊化示範企業和 20 家資訊化試點園區發展電子信息，電商龍頭阿里巴巴也受益於此政策（張鳳安 2008）。

註⑰ 參見浙江省人民政府（2002）、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b），浙江省政府推出「數字浙江」、「天堂矚谷」和「濱江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政策。

註⑱ Atherton 和 Smallbone（2013, 20）主張與全球經濟整合越深的地方政府，越能提供有效的中小企業發展政策資源框架運用，此外，越是發達地區越有可能出現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市場。

2000 年的 IT 科技泡沫直接改變 B2B 所有電子商務企業的市場地位，阿里巴巴相較於國企的市占率與盈利呈現快速上升（彭建真 2001），¹⁹以中外商業資訊為主的浙大網新受到衝擊，2003 年呈現虧損的營運狀態，²⁰稅捐隨之減少，地方政府只有轉向與電商私企阿里巴巴合作發展電子商務。

2.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變化，發生在 2003 年到 2008 年之間，當時浙江省政府遇到 SARS、自然災害、失業率偏高、物價上漲及投資過熱等諸多問題，為了有效回應廣泛的社會需求（Yang 2010, 8），其主要政策任務是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彌補因 SARS 所減少的貿易營收。是以，浙江省政府規劃電子商務則與物流相結合並且發展增值服務。²¹如前所述，虧損的地級國企無法提出利益誘因。

阿里巴巴所屬電子商務為浙江省政府提供 GDP 增長、中小企業發展機會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利益誘因，而這些皆有助於地方的政績表現（Tihanyi, Pedersen, Devinney and Banalieva 2015, 55）。²²電子信息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帶動效果方面，從 2003 年到 2008 年浙江省電子商務業主營業收入，從人民幣 963.42 億元增加到 2540 億元（中國信息產業年鑑編委會 2011, 532-533）；2004 年到 2010 年之間，營業利潤從 109.08 億元上升到 181.5 億元。以稅收貢獻而言根據《杭州市統計年鑑》顯示，在 2002 年到 2006 年之間，電子信息業對地方稅收的貢獻從人民幣 44.57 元增長到 78.9 億元，整體增長 77.8%，2007 年電子商務已占該市行業總收入的 1/6。就業人口方面，直接就業人員從 27.83 萬人增加到 56.35 萬人（中國信息產業年鑑編委會 2011, 532-533）。

3. 阿里巴巴與地方政府的合作

浙江省政府提供阿里巴巴網路支付認證擔保系統的審核許可，使阿里巴巴藉由「誠信通」領先其他國內對手，具備主導市場的地位；阿里巴巴也提供地方幹部升遷所需的政績表現，兩者之間形成「共生」的合作關係。惟網上支付模式與支付安全是由國有銀行監管與執行，在缺乏取代既有制度的能力之下，「誠信通」（當時

註¹⁹ 在成為大型企業之前市占率最重要，地方政府照顧地方小國有企業，但是效果有限。（作者訪談，日本三井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金台夕照，2015 年 08 月 01 日）。阿里巴巴的「中國供應商」提供地級國企產能過剩的行銷機會。

註²⁰ 根據浙大網新的 2003 年半年公司財報，淨利潤較上年度減少 44.82%。參見深圳證券交易所 2003。

註²¹ 參見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a）。

註²² 作者訪談，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大學，2017 年 12 月 20 日；作者訪談，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2017 年 12 月 21 日。

表 1 電子商務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貢獻（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分	200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生產總值		482.28 (5.48)	522.78 (5.24)	607.81 (4.98)	759.98 (4.43)	885.76 (5.51)
物流、批發零售		(25.28)	(35.85)	(36.48)	(37.95)	(38.63)
營業利潤	109.08	181.53		181.5		
稅金	13.42	25.23		226.78		
就業人數	90,735	174,783		420,800		

資料來源：《浙江經濟普查年鑑》（2004; 2008; 2012）。

稱爲「網上有名」) 的推出，創造了地方政府背書的新形態網路交易安全系統，與當時正式交易系統，形成兩套並存的網路交易安全系統。

阿里巴巴在 2002 年推出「誠信通」產品，誠信通是委託第三方認證機構，^② 透過地級工商局審核企業資格所建立的網路交易安全評估系統，確保客戶網上信用，減少交易成本。2003 年 10 月阿里巴巴和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沈立強簽署全面合作協議，共同建立網路銀行的安全交易支付結算模式。因爲「誠信通」解決了其他國企或外商競爭所無法處決的中小企業網路交易信用擔保問題，使阿里巴巴確立 B2B 的龍頭地位。^④

二、制度轉化：螞蟻金服

隨著網路金融的問題不斷增加，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兩個監管機關之間對政策目標差異，促使了國有擔保企業與阿里巴巴合作，而螞蟻金服以轉化方式改變中央關於小微金融政策的實質內容。

註② 誠信通的認證單位爲鄧白氏、奧美資訊有限公司以及華夏國際企業信用資訊有限公司，其中華夏國際企業信用資訊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曹小寧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商業部、國內貿易部、國家國內貿易局，並於 2003 年承辦浙江省台州市三年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工程。參見牛暢（2003, 84-85）。

註④ 2006 年以 68.04% 的業務收入占比大幅超越外商環球資源（12.08%）、本土私企慧聰（5.09%）和國企中國化工網（2.86%），參見辛永健（2007）。

(一) 網路金融小微信貸的制度缺口

網路金融（中國稱互聯網金融）^⑥按不同機構歸口管理，並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門負責具體監督管理，監管制度的管轄重疊問題，創造了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策略空間。多頭管理之下，部門之間存在著意見不一致的狀況，造成微弱的行政能力，使這些反對者合作產生網路金融政策的轉化結果。

管轄重疊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主要職責是具體的金融監管，而人民銀行負責貨幣政策與穩定金融秩序，但是，事實上國務院發布的規範性文件卻是人民銀行負責監管協調，造成網路金融主要監管機構的職權重疊。第二，網路金融的監管機構均為部級機構，^⑦彼此之間不存在最高決策者。以部際聯繫會議為例，聯席會議沒有明確的決策機制、議事規則與決策權限，聯席會議不替代、不削弱現行有關部門，^⑧實質上只是信息交流的平台（范佳慧 2018）。第三，中央與地方金融管理機構的監管重疊，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因重視地方利益，而選擇性配合中央政策，並且因為地方金融管理部門眾多，^⑨產生「重審批、輕監管」的狀況（周學東 2015），使網路金融有更多創新空間。

網路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意見不一致的狀況，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採取正面態度，國務院允許民營網路金融的發展空間，相對地，銀監會及國有銀行則採取負面態度。2013 年中國網路金融發展初期，國務院支持網路金融，^⑩但是證監會卻對「餘額寶」的基金部分進行調查（趙磊、朱傳婕 2013），銀監會禁止網路金融關於間接、穩性的第三方金融信用擔保部分。^⑪2014 年網路金融呈現噴井式成長，國務院為維持市場穩定，加強對網路金融管理，允許網路金融在未違法的情況下繼續發展，責由人民銀行監管協調，規則由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共同制定。^⑫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秉持著肯定的態度。^⑬相反地，銀監會並不支持民

註⑥ 網路金融屬於一種多種金融商品的組合，這種組合商品在中國稱為交叉性金融商品。

註⑦ 網路金融的監管主要是「一行三會」，其他監管機構包括工商總局、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一行三會」係指人民銀行、銀監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

註⑧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a）。

註⑨ 地方金融監管機構分散，小額貸款、融資性擔保、典當、農民資金互助社分別由金融辦公室、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商務廳、農業委員會監管，參見周學東（2015）。

註⑩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b）。

註⑪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a）。

註⑫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4）。

註⑬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2014），文中提及：「有利於發揮民間資本作用，引導民間金融走向規範化。」

營網路金融單位，其屬意由國有銀行主導網路金融；^③四大國有銀行聯合採取下調第三方快捷支付限額的打壓行動（田珍祥、謝正軍 2014）。

（二）螞蟻金服與中央級國有機構合作

隨著網路金融小額信貸的蓬勃發展，發生諸多的 P2P 網路金融擔保信用問題糾紛（何文茜 2014；和訊網 2014）。網路金融產業政策的不一致與管轄重疊，創造了策略性空間，亦即，國務院與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企業採取正面的態度，而銀監會與國有銀行則持否定的態度。再者，國務院傾向由人民銀行帶領協商，使金融擔保機構有機會與私企合作。

1. 國企競爭對手

在處理農村的小微信貸問題方面，提供該項信貸的金融單位包括國有銀行分行、村鎮銀行。首先，國有銀行因爲設立辦事處的房租成本、設備維護費用、員工基本薪資調漲等因素對農村金融興趣缺缺。^④其次，2006 年後村鎮銀行才恢復農民小額貸款，但是村鎮銀行存在著籌資能力不足、專業人力缺乏而衍生的信用風險評估系統不全等問題（蔣玉敏 2011）。

國有銀行推出的網路金融商品，遠不及「餘額寶」^⑤的普及率，例如建設銀行推出「善融商務」、中國銀行推出「中銀易商」、工商銀行推出「融 e 購」（李靜瑕、劉田 2014；勞佳迪 2017）。隨著網路技術發展，中小企業與農民可以透過網路金融獲得小額信貸（和訊網 2014）。國有銀行、地方法人銀行作爲網路金融業務的國家隊，^⑥卻存在著服務大企業的偏好，此外，在欠缺個人信用評估系統的現狀下，礙於潛在風險，難以對個人進行信貸，這些因素使國有銀行難以達到小微新貸政策目標。

2. 中投保

個人網路交易的信用評價最初是由私有企業自行設立，銀監會對此非正式制度淡然處之，國有銀行亦將其作爲參考依據之一（章苒、蔡國兆 2007）。人民銀行對非國有銀行的信用評估系統採取支持的態度，例如，2013 年年底人民銀行放寬

註③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

註④ 參見勞佳迪（2017）：作者訪談，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2017 年 12 月 21 日。

註⑤ 「餘額寶」具有支付寶及基金投資的功能，是螞蟻金服的產品之一。

註⑥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b）、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b）、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

信貸評估業務管理，^㉗2015年4月讓民營微信公司著手準備合法化，^㉘2015年7月由人民銀行與九個部會聯合正式許可信用中介組織。^㉙

中國投融資擔保公司（以下簡稱中投保）^㉚為中國最大的專業擔保機構，由財政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發起設立，現為國家開發銀行所屬國家開發投資公司集團的成員企業。央企與私企合作建立網路金融平台與個人信用系統，這樣的制度創新需要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才會持續存在（Yang 2010, 5），^㉛當中央相關主管對網路金融產業發展達成共識以後，^㉜中投保才開始尋求網路金融的合作對象。2014年年底之前，中投保主要負責工程擔保的業務；2015年後，公司官方表示響應中央政府的小微金融政策，一方面，在獲得政府大力支持下，成立小微金融擔保和互聯網路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與阿里巴巴合作成立網路金融公司。

3. 阿里巴巴與中投保的合作

阿里巴巴作為權力不足的行動者，透過與中央級國有企業合作，逐步改變國有銀行主導的權力結構，使網路金融政策目標發生實質內容的轉化。螞蟻金服成為協助中小企業融資的非正式制度渠道，使現有金融系統有效降低網路金融風險，產生金融制度的創新效果。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合作中，中投保提供阿里巴巴網路金融所需要的具備官方相關的信用擔保背書，而阿里巴巴提供中投保一套低成本、普及性及有效信用的小微信貸系統。

2014年11月底，中投保為最大出資者，與恒生電子、螞蟻金服（阿里小微金融服務公司）等共同設立「浙江三潭金融資訊服務股份公司」（後更名「網金所」）^㉝，發展P2P網路金融（梁瑀可、高晨 2015）。該項合作成功的原因包括不

註^㉗ 參見朱丹丹（2013）。

註^㉘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b）。

註^㉙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a）。

註^㉚ 2010年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引進官方中信資金等股東，而中信資金在2012年亦有入股阿里巴巴。

註^㉛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5a）的規定，人民銀行擁有統一協調的權限，確保網路金融市場風險管理。銀監會、保監會及證監會保有信用系統的主要審查權限，只賦予中投保擔任信用中介機構的地位。網路金融平台涉及組織、制度與技術的多重管理（宣博、易開剛 2018），政府、市場、企業之間需要相互協力（劉賓 2018），相關政策、法規、稅收等涉及監管機構眾多，難以由單一監管機構規範。為了確保網路金融風險有效控制，改變過往央企承擔或央企外包給私企的方式，採用央企與私企共同合作的雙主體方式。

註^㉜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a）。

註^㉝ 三潭金融涉及消費金融、投資理財、保險、網上銀行、小貸公司、擔保體系和金融資訊服務，公司的分工如下，恒生電子負責金融IT技術保障，螞蟻金服則提供平臺運作經驗與流量入口，中投保擁有豐富的投融資與擔保資歷。

需設點的優勢，以及借重阿里巴巴的平台客戶，最重要的是，不同於傳統金融機構的需要企業提供「抵押」、「聯保互保」（清華大學微金融課題組 2015；俞雲芳 2013），改採個人交易信用擔保，亦即使用中投保擔保資訊與「芝麻信用」。^④人民銀行對這樣合作雖不否認，卻也不提供「最後貸款人」的保證（陳寶衛 2014）。

民營網路金融屬於灰色地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民營網路金融的制度合法性擴張是制度化的重要因素（Raffaelli and Glynn 2015），螞蟻金服取得法律上合法地位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建立信用系統，2015 年阿里巴巴因應人民銀行的個人徵信政策，成立「芝麻信用」並取得營業證照，與最高法院、貴州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合作，確立「芝麻信用」的效力，並且投資中國郵政銀行（李宓、左婭 2015）。第二階段是申請設立民營銀行，銀監會的民營銀行試點^⑤核准意味著民營資本享有與國有資本相等的待遇（史進峰、張燦 2014），2015 年阿里巴巴與萬向組合浙江網商銀行在浙江進行試驗並通過審核。

綜上所述，螞蟻金服之所以可以改變國有銀行主導的小微金融，主要原因如下：一，螞蟻金服符合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⑥二，螞蟻金服處理國有銀行長久無法改善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普惠金融的農村金融問題。

伍、結論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經歷不同發展階段裡，存在著不同策略與行爲。在成爲大型企業之前，私企提供經濟利益誘因促使地方政府改變政策解釋，藉以尋求與國企競爭的市場地位。當私企發展成爲大型企業^⑦時，私企更容易向國有機體或地方政府取得資源，私企擁有更多機會有利於自身的市場規範，「轉化」產業政策規範，例如「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合作。^⑧

新制度主義認爲制度變遷發生在「關鍵時刻」，並且制度變遷是行動者偏差選擇行爲的累積結果。以阿里巴巴爲例，阿里巴巴成爲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關鍵

註④ 「芝麻信用」的信用評估系統依據個人交易紀錄、尋找第三方爲企業增信，參見董莉（2017）。

註⑤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5）。

註⑥ 作者訪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2017 年 12 月 13 日。

註⑦ 大型企業的認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標準。

註⑧ 例如 2014 年阿里巴巴與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建設銀行、平安銀行、中國郵政儲備銀行、上海銀行、興業銀行等 7 家銀行合作推出「網商貸高階版」，給外貿電商企業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貸款服務。貸款資金來自合作銀行，並由銀行或保險公司擔保壞帳。參見環球網（2014）。

時刻」發生於科技泡沫造成國企競爭對手式微所創造的機會，尤其是阿里巴巴透過浙江省政府協助，取得工商銀行浙江分行的合作起點。因為監管體系的制度環境有所不足，提供地方政府與國家冠軍私企對既有制度的解釋機會，以及創造產業政策內涵的空間。當國企無法提供與私企相當的利益誘因時，私企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形成調適性非正式制度。從阿里巴巴的「誠信通」及「螞蟻金服」個案，吾人認為從地方小企業發展為「國家級」冠軍企業的前提是非政府完全壟斷產業，而其成為國家冠軍私企的原因如下：第一，有助於達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重要產業政策目標；第二，該行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興產業的規範尚未完整而具有解釋和創造的空間；第三，私企與政府機構的合作形成調適性非正式制度，而此非正式制度有助於補充或替代正式制度的不足，如螞蟻金服的網商銀行與村鎮銀行；第四，私企具有獨特營利模式，國企難以模仿，例如廣大客戶平台的誠信通、第三方支付의 支付寶或是螞蟻金服運用阿里雲的「芝麻信用」。

過往的文獻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治啄食順序的特徵不利於私企，私企若是高技術型企業往往作為上游國企的協助者，如吉利汽車；或私企僅能投資混和型國企（私有化）；或被國企所兼併、收購。然而，本文顯示企業在符合前述因素時，有可能透過與政府合作取得與國企一樣的平等地位，甚至主導市場與規範。私企與政府的合作不似紅色資本家的缺乏自主性，亦不是企業全然依靠非正式金融（民間借貸、影子銀行）或依靠非正式組織而有辦法成為冠軍企業。在誠信通個案中，外部 IT 泡沫的環境變化，造成行動者自主性的改變，亦即阿里巴巴取得與浙江省政府對網路交易安全的合作。在螞蟻金服個案中，螞蟻金服與國企中投保的合作，改變國有銀行優先的金融體系，民營網路金融公司主導中小企業融資，改變了原先由國有銀行主管小額信貸的權力結構。

根據「誠信通」與「螞蟻金服」的個案，政府對冠軍私企的優惠不會超過國企，而是改變不利於冠軍私企的制度環境，甚至制定有利於冠軍私企的政策。政府—冠軍私企關係與政府—國企關係這兩組關係互動而言，政府—冠軍私企關係更多是一種調適性非正式關係，用以達成政府官員的政策目標；政府—國企關係裡國企肩負政治任務，黨國體制之下國企的執行彈性受限，當國企無法完成政治任務之時，政府—冠軍私企關係成為替代關係。

中國的條塊問題提供了制度變遷的空間，然而，用何種變遷類型呈現，取決於私企與相關政府機構的合作對既有制度屬於補充或創新。當合作對既有制度發揮了補充不足的功能，亦即完成特定政策任務時，非正式制度以「層化」形式存在。例如，在「誠信通」個案中，國有銀行本身存在網路支付系統，卻缺乏網絡交易擔保

機制，誠信通彌補這個缺點，是以，在既有制度支持者有限的掌握網路支付資訊的狀況下，誠信通以層化形式存在。當合作對既有制度發揮了制度創新的功能時，非正式制度以「轉化」形式存在。以「螞蟻金服」爲例，面臨網路金融信貸的興起，國有銀行對大型企業信評機制的偏好，無法回應小額信貸的信用擔保所必需的資訊，再加上信用擔保的管轄重疊，使阿里巴巴有機會與中投保的合作，以轉化的形式直接改變中央小微金融的實質內涵與權力結構。

綜言之，本文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以下修正：無論是否爲共產國家，當既有正式制度無法有效回應時，試圖改變既有制度的行動者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形成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影響了國家資源分配的結構。亦即，國家直接作爲市場成員的特質雖未改變，但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趨向間接，並且非正式制度改變了政府相關部門對目標企業的選擇。在關鍵時刻過程中，層化與轉化結果的差異來自國企主導產業所產生成本與私企可以提供利益。在中國，改變行動者的策略性空間恰巧來自於黨國體制的制度遺留，依據本文分析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發生於以下條件：外生變遷因素造成市場競爭者市占率及利潤發生巨大變化時，並且在特定領域存在著策略性空間，當既有制度支持者無法完全掌握資訊的情況下，改變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將產生制度變遷的結果。惟「關鍵時刻」並非本文研究重點，冀將來進一步探討相關議題。

* * *

(收件：106年3月14日，接受：108年4月18日)

An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f 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 in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The Case Study of Alibaba Group

Chia-Chi Cheng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duces the 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 (PONCs) and further devotes its attention on explaining how the PONCs can influence the policy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different typolog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Using Alibaba a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ppearance of PONCs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purpose. On the one h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causes slacks, so the PONCs are able to explain those incomplete institutions, which in turn cause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ake biased choices based on these slacks. As a result, this cooperation creates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the PO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shows the change of their cooperation model from layering to conversion. Thus, POEs can expand their market shares, as well as earn the resources equivalent to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ultimately, have the ability to suppress them to become the PONCs.

Keywords: China,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 Alibaba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01，〈浙大網新近期工作備忘錄〉，《人民網IT信息》，<http://www.people.com.cn/fuwu/pic/y85.html>，查閱時間：2017/09/28。People's Daily Online. 2001. "Zhedawangxin jinqi gongzuo beiwanglu" [INSIGMA Memorandum about Recent Work]. (Accessed on September 28, 2017).
- 中國人民銀行，2015a，《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7/t20150720_1332370.htm，查閱時間：2019/05/21。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2015a. "Guanyu cujin hulianwang jinrong jiankang fazhan de zhidao yijian" [Guidelines on Promoting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人民銀行，2015b，《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5-01/05/content_2800381.htm，查閱時間：2019/05/21。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2015b. "Guanyu zuohao geren zhengxin yewu zhunbei gongzuo de tongzhi" [Notice on Preparing for Personal Credit Investigation Busines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2014，《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4》，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Financial Stability Analysis Group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2014. "China jinrong wending baogao 2014" [China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14].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Publishing House.
- 中國信息產業年鑑編委會，2011，《中國信息產業年鑑》，北京：中國工信出版集團電子工業出版社。Zhongguo xinxi chanye nianjian bianweihui. 2011. *Zhongguo xinxi chanye nianjian* [China Information Industry Yearbook]. Beijing: China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shing.
-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6，〈2015年中國網路零售市場資料監測報告〉，http://www.ec.com.cn/article/btob/201605/9544_1.html，查閱時間：2016/05/30。CECRC. 2016. "2015 zhongguo wanglu lingshou shichang ziliao jiance baogao" [China's Internet Retail Market report 2015]. (Accessed on May 30, 2016).
-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a，《商業銀行同業融資管理辦法》，<https://ftalphaville-cdn.ft.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China-doc-9.pdf>，查閱時間：2019/05/2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13a. "Shangye yinhang tongye rongzi guanli banfa" [Interbank Industry of Commercial Bank Financing Management Measur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b，《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3-08/29/content_5023743.htm，查閱時間：2019/05/2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13b. “Guanyu jinyibu zuohao xiaowei qiye jinrong fuwu gongzuo de zhidao yijian.” [Guiding Opin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中國銀監會關於完善和創新小微企業貸款服務》，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4-07/23/content_5023757.htm，查閱時間：2019/05/21。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14. “Zhongguo yinjianhui guanyu wanshan he chuangxin xiaowei qiye daikuan fuwu” [About Perfecting and Innovating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 Loan Servic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5，《關於促進民營銀行發展指導意見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26/content_9980.htm，查閱時間：2019/05/2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15. “Guanyu cujin minying yinhang fazhan zhidao yijian de tongzhi.” [Notice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ank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關於大力推進證券投資基金行業創新發展的意見》，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406/t20140613_256024.html，查閱時間：2019/05/21。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14. “Guanyu dali tuijin zhengquan touzi jijin hangye chuangxin fazhan de yijian” [Opinions on Vigorously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Industry].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7，《電腦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http://www.mps.gov.cn/n2254314/n2254409/n2254443/n2254451/c4113546/content.html>，查閱時間：2019/05/21。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7. “Diannao xinxi wanglu guoji lianwang anquan baohu guanli banfa”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International internet Security].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1/4854303.html>，查閱時間：2019/05/21。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8. "Zhonggong zhongyang, guowuyuan guanyu qieshi zuohao guoyou qiye xia ang zhigong jiben shenghuo baozhang he zaijiuye gongzuo de tongzhi" [Notice on Conscientiously fulfilling the Basic Life Insurance and Reemployment for Laid-off Work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2，《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資訊化重點專項規劃》，<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62/n1146650/c3073978/part/3073979.pdf>，查閱時間：2019/05/21。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2. "Guomin jingji he shehui fazhan dishige wunian jihua zixunhua zhongdian zhuanxiang guihua"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alized Planning for Informationization].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a，《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附件：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08/20/content_2470225.htm，查閱時間：2019/05/21。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Zhongguo renmin yinhang guanyu jinron jianguan xiediao jizhi gongzuo fangan de qingshi Fujian: jinrong jianguan xidiao buji lianxi huiyi zhidu" [Consultation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on the Work Program of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nex: Inter-ministerial Joint Conference System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b，《關於金融支援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11/n3057521/n3057523/c3544223/content.html>，查閱時間：2019/05/21。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Guanyu jinrong zhiyuan xiaowei qiye fazhan de shishi yijian." [Opin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4，《國務院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http://paynews.net/plugin.php?id=falufagui:falufaguiview&aid=453>，查閱時間：2019/05/21。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Guowuyuan guanyu jiaqiang yingzi yinhang jianguan youguan wenti de tongzhi"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bout Shadow Bank and its issues].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生產委員會，2003，《中國工業年鑒》，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The State Council Production Committee. 2003. *Zhongguo gongye nianjian* [*Chinese Industri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Labor Social Security Publishing House.
- 牛暢，2003，〈淘寶網攜手工行過〉，《電子商務世界》，11：84-85。Niu, Chang. 2003. “Taobao wang xieshou gonghang guo” [Taobao cooperates with ICBC]. *Electronic Business World*, 11: 84-85.
- 王芹、朱麗平、朱敏，2016，〈政企關係影響民營企業發展作用機制：基於交易成本視角〉，《天津商業大學學報》，36 (5)：47-53。Wang, Qin, Li-ping zhu, and Min Zhu. 2016. “Zhengqi guanxi yingxiang minying qiye fazhan zuoyong jizhi: jiyu jiaoyi chengben shijiao”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36 (5): 47-53.
- 王春福，2012，〈民營企業政治行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以浙江省民營企業為例〉，《學習與探索》，2：49-53。Wang, Chun-fu. 2012. “Minying qiye zhengzhi hangwei youxiaoxing de lixing fenxi: yi Zhejiang sheng minying qiye wei li” [A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olitical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Study & Exploration*, 2: 49-53.
- 史進峰、張燦，2014，〈股東延伸監管：首批5家民營銀行四大模式試點方案全揭秘〉，http://www.xcf.cn/mobile/201403/t20140312_560060.htm，查閱日期：2018/04/11。Shi, Jin-feng, and Shuo Zhang. 2014. “Gudong yanshen jianguan: Shoupi 5 jia minying yinhang sida moshi shidian fangan quanjiemi” [Extending the Supervision of Shareholders: The first batch of Four Private Banks Piloted the Four Models]. (Accessed on April 11, 2018).
- 田珍祥、謝正軍，2014，〈網上支付限額到底爲了啥〉，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403/26/t20140326_2554365.shtml，查閱時間：2018/04/12。Tian, Zhen-xiang, and Zhen-gjun Xie. 2014. “Wangshang zhifu xian'e daodi weilsha” [Why does the Online Payment have new Limitation?].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8).
- 朱丹丹，2013，〈央行改革信貸評級管理方式，中小機構恐承壓〉，<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3-11-27/790679.html>，查閱時間：2019/05/21。Zhu, Dan-dan. 2013. “Yanghang gaige xindai pingji guanli fangshi: Zhongxiao jigou kong chengya.” [Central Bank Changes Credit Rating Manage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Organizations are under Pressure].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何文茜，2014，〈101家問題P2P網貸公司分析〉，《商業經濟》，7：88-89。He, Wen-qian. 2014. "101 jia wenti P2P wangdai gongsi fenxi" [Analysis of 101 P2P Network Loan Companies]. *Business Economy*, 7: 88-89.
- 何佳，2007，〈中國證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二十一世紀評論》，100：11-17。He, Jia. 2007. "China zhengquan shichang de kaifang he fazhan" [China's Securities Market: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00: 11-17.
- 吳敬璉，2010，《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Wu, Jing-lian. 2010.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gaige jiaocheng*.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Course].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 宋玲，1999，〈積極穩妥地發展我國電子商務〉，《人民日報》。10月29日。Song, Ling. 1999. "Jiji wentuo di fazhan woguo dianzi shangwu" [Actively and Steadily Develop China's E-commerce]. *Renmin Ribao* (October 29).
- 李永進，2013，《北京市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Li, Yong-jin. 2013. *Beijing shi zhongxiao qiye fazhan yanjiu*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Es in Beijing].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李宓、左婭，2015，〈郵儲銀行戰略引資451億元〉，《人民日報》，12月10日。Li, Mi, and Ya Zuo. 2015. "Youchu yinhang zhanlue yinzi 451yi yuan"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Strategically Invests 451 Billion Yuan]. *Renmin Ribao* (December 10).
- 李靜瑕、劉田，2014，〈釐清餘額寶的幾個問題〉，<http://tech.sina.com.cn/i/2014-02-25/02159188552.shtml>，查閱時間：2017/12/30。Li, Jing-xia, and Tian Liu. 2014. "Liqing Yue Bao de jige wenti" [Clarify Some Problems of the Yu'e Bao].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17).
- 辛永健，2007，〈06年Q4 B2B市場規模達6.3億，阿里巴巴名列第一〉，<http://tech.163.com/07/0313/20/39G7UDP2000915BF.html>，查閱時間：2017/1/8。Xin, Yong-jian. 2007. "06nian Q4 B2B shichang guimo da 6.3yi, Alibaba minglie di yi"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Alibaba Ranked as the first one based on its Market Size of 630 Million]. (Accessed on January 8, 2017).
- 周黎安，2008，《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Zhou, Li-an. 2008. "Zhuanxing zhong de difang zhengfu: guanyuan jili yu zhili"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ransition: Official Incentives and Governance*].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 周學東，2015，〈央地金融監管的邊界與協調〉，<http://www.xinhuanet.com/>

- finance/2015-03/24/c_127613201.htm，查閱時間：2018/04/12。Zhou, Xue-dong. 2015. “Yangdi jinrong jianguan de bianjie yu xiediao” [The Border and Coordina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8).
- 和訊網，2014，〈網貸兌付危機潮再起，投資人近10億資金難追回〉，<http://iof.hexun.com/2014-01-26/161790243.html>，查閱時間：2017/12/30。Hexun. 2014. “Wangdai duifu weijichao zaiqi, touziren jin 10yi zijin nan zhuihui” [The Crisis of Net Lending: almost 1 Billion Funding is Hard to recover].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17).
- 於曉、矯磊，2011，〈「走出去」戰略概述〉，<http://qwgzzyj.gqb.gov.cn/yjyjt/159/1743.shtml>，查閱日期：2017/11/23。Yu, Xiao and Lei Jiao. 2011. “Zou chu qu’ zhanlue gaishu.” [“Reviewing the Going Out” Policy]. (Accessed on November 23, 2017).
- 俞雲芳，2013，〈芻議浙江中小企業互保聯保困局的破解〉，《中國市場》，21：34-35。Yu, Yun-fang. 2013. “Zouyi Zhejiang zhongxiao qiye hubao lianbao kunju de pojie” [Analysi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Mutual Assistance and Guarantee of the Crack]. *China Market*, 21: 34-35.
- 信息化研究部，2009，〈中國信息化30年若干方面回顧與思考〉，<http://www.sic.gov.cn/News/249/1510.htm>，查閱時間：2018/04/02。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2009. “China xinxihua 30nian ruogan fangmian huigu yu sikao”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Some Aspects of China's 30 Years of Informatization]. (Accessed on April 2, 2018).
- 宣博、易開剛，2018，〈互聯網平台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光明日報》，03月27日。Xuan, bo, and Kai-gang Yi. 2018. “Hulianwang pingtai qiye de shehui zeren zhili”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platform]. *Guang Ming Daily* (March 27).
- 范佳慧，2018，〈一行三會的前世今生〉，《國際金融報》，3月12日。Fan, Jia-hui. 2018. “Yihang sanhui de qianshi jinsheng”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PBC, CBRC, CSRC and CIRC].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News* (March 12).
- 凌志軍，2005，《聯想風雲》，北京：中信出版社。Ling, Zhi-jun. 2005. *Lianxiang fengyun [Lenovo Story]*. Beijing: CITIC Group.
- 時代週報，2016，〈從中關村到後海：聯想南移之路〉，<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603/287614.htm>，查閱日期：2016/5/24。Time Weekly. 2016. “Cong Zhongguancun dao Houhai: Lenovo nanyi zhi lu” [From Zhongguancun to Houhai: Lenovo’s Road to the South]. (Accessed on May 24, 2016).
- 浙大網新，2002，〈閃光的思想：浙大網新總裁陳純訪談錄〉，<http://www.insigma.com.cn/mobile/index.php/news/detail/1811.html>，查閱日期：2017/11/03。INSIGMA. 2002.

- “Shanguang de sixiang: zhedawangxin zongcai chenchun fangtanlu” [The Idea of Flash: Interview with Chen Chun, the New President of INSIGMA]. (Accessed on November 3, 2017).
- 浙江日報，2003，〈「相約在高新」2003年新春人才交流大會〉，2月18日。Zhejiang Ribao. 2003. “Xiangyue zai gaixin’ 2003nian xinchun rencai jiaoliu dahui” [“Meet in High-tech” Experts Exchange Meeting 2003 in Spring]. *Zhejiang Ribao* (February 18).
- 浙江省人民政府，2002，〈《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http://www.zj.gov.cn/art/2016/4/13/art_5495_2105152.html，查閱時間：2019/05/21。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2. “Zhejiang sheng guomin jingji he shehui fazhan dishige wunian jihua gangyao” [The outline of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a，〈《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年工作報告》〉，<http://www.zhejiang.gov.cn/col/col11546440/index.html>，查閱時間：2019/05/21。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3. “Zhejiang sheng renmin zhengfu 2003nian gongzuo baogao” [Annual Report of People’s Govern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of 2003].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b，〈《數字浙江建設規劃綱要》〉，http://www.zjkjt.gov.cn/news/node03/detail0304/2004/0304_1661.htm，查閱時間：2019/05/21。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3. “Shuzi Zhejiang jianshe guihua gangyao” [The outline of Digital Zhejiang Construction Planning].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 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次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04，〈《浙江經濟普查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The First Time Economic Census Leading Group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4. *Zhejiang jingji pucha nianjian* [*Zhejiang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次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08，〈《浙江經濟普查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The Second Time Economic Census Leading Group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8. *Zhejiang jingji pucha nianjian* [*Zhejiang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三次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12，〈《浙江經濟普查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The Third Time Economic Census Leading Group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12. *Zhejiang jingji pucha nianjian* [*Zhejiang*

-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張旭東、劉錚，2013，〈聽取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稿的意見〉，《人民日報》，1月30日。Zhang, Xu-dong, and Zheng Liu. 2013. "Tingqu gejie renshi dui zhengfu gongzuo baogao gao de yijian" [Listening to the Views of People o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Renmin Ribao* (January 30).
- 張秀發、王大順，1999，〈電子商務：中國的希望和挑戰〉，《人民日報》，2月28日。Zhang, Xiu-fa, and Da-shun Wang. 1999. "Dianzi shangwu: Zhongguo de xiwang he tiaozhan" [E-commerce: China's hopes and challenges]. *Renmin Ribao* (February 28).
- 張洋、張瀟月，2014，〈更加自覺為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建設作出貢獻〉，《人民日報》，9月6日。Zhang, yang, and Xiao-yue Zhang. 2014. "Gengjia zijiao wei wanglu anquan he zixinhua jianshe zuochu gongxian" [More Consciously Contribute to Network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Renmin Ribao* (September 06).
- 張宿堂、趙承、張旭東、陳芳、劉錚、吳晶，2013，〈夢想在召喚，改革在揚帆：紀念改革開放35週年〉，《人民日報》，11月08日。Zhang, Xiu-tang, Cheng Zhao, Xu-dong Zhang, Fang Chen, Zheng Liu, and Jing Wu. 2013. "Mengxiang zai zhaohuan gaige zai yangfan: jinian gaige kaifang 35 zhounian" [Dream is Calling, Reform is Sailing: Commemorating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Renmin Ribao* (November 8).
- 張鳳安，2008，〈馬雲熱超出經濟領域：地方政府爭邀阿里巴巴〉，<http://business.sohu.com/20080322/n255850181.shtml>，查閱時間：2017/9/25。Zhang, Fen-gan. 2008. "Mayunre chaochu jingji linyu: difang zhengfu zhengyao Alibaba" [Jack Ma Exceeds the Economic Fiel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Competing to Invite Alibaba].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17).
- 梁瑀可、高晨，2015，〈「三潭金融」終於露面，網金社能否與陸金所抗衡？〉，<http://www.jiemian.com/article/311551.html>，查閱時間：2017/12/30。Liang, Yu-ke, and Chen Gao. 2015. "'Santan jinrong' zhongyu lumian, wangjinshe nengfou yu lujinsuo kangheng?" ["P2PYU" Finally Show up: Can NetCom Compete with Lujin?].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17).
- 清華大學微金融課題組，2015，〈「互聯網+」時代：小微企業經營與融資報告（二）〉，《首席財務官》，16：50-53。Tsinghua University micro finance group. 2015. "'Hu lian wang +' shidai: xiaowei qiye jingying yu rongzi baogao (2)" ["Internet +"Era: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Business and Financing Report (2)]. *CFO World*, 16：50-53.

- 章苒、蔡國兆，2007，〈能否解中小企業融資之渴？〉，《文匯報》，7月23日。Zhang, ran, and Cai Guo-zhao. 2007. “Nengfou jie zhongxiao qiye rongzi zhi ke?” [Can It Solve the Thirst of SME Financing?]. *Wenweipo* (July 23).
- 許揚帆，2003，〈中國黃頁「新兵入伍」浙大網新醞釀香港上市〉，<http://www.insigma.com.cn/index.php/news/info?id=1826>，查閱時間：2017/09/28。Xu, Yang-fan. 2003. “Zhongguo huangye ‘xin bing ru wu’ zhedawangxin yunniang Hong Kong shangshi” [China Yellow Pages “Recruited”: INSIGMA Brewing Hong Kong Listing]. (Accessed on September 28, 2017).
- 陳寶衛，2014，〈互聯網基金發展現狀、影響及監管對策：以餘額寶爲例〉，《金融發展研究》，5：82-84。Chen, Bao-wei. 2014. “Hulianwang jijin fazhan xianzhuang, yingxiang ji jianguan duice: yi yuebao weili” [The Status Quo, Impact and Supervision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et Funds: A Case Study of Yu'e Bao]. *Journa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5:82-84.
- 勞佳迪，2017，〈新金融時代開啓 四大國有銀行爲何集體「低頭」？〉，<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170717/0/2/2/%E6%96%B0%E9%87%91%E8%9E%8D%E6%99%82%E4%BB%A3%E9%96%8B%E5%95%9F-%E5%9B%9B%E5%A4%A7%E5%9C%8B%E6%9C%89%E9%8A%80%E8%A1%8C%E7%82%BA%E4%BD%95%E9%9B%86%E9%AB%94%E4%BD%8E%E9%A0%AD-7692070.html>，查閱時間：2018/04/11。Lao, Jia-di. 2017. “Xinjinrong shidai kaiqi: Sida guoyou yinhang weihe jiti ‘ditou’?” [Facing the New Financial Era: Why Did the Four Major State-owned Banks Collectively Obey?]. (Accessed on April 11, 2018).
- 彭建真，2001，〈阿里巴巴成功源於識時務〉，<http://www.people.com.cn/GB/it/49/4695/20010821/540194.html>，查閱時間：2017/2/5。Peng, Jian-zhen. 2001. “Alibaba chenggong yuanyu shishiwu” [Alibaba's Success Stems from its Sophisticated Adapta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5, 2017).
- 馮興元，2012，〈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47949?page=3>，查閱時間：2017/11/22。Feng, Xing-yuan. 2012. “zhongguo minying qiye de shengcun huanjing.”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17).
- 董莉，2017，〈螞蟻金服：農村金融金字塔「方法論」〉，《新疆界》，453：22-24。Dong, Li. 2017. “Mayijinfu: nongcun jinrong jinzita ‘fang fa lun’” [Ant Financial Service: Financial Pyramid “Methodology” in the Rural regions]. *New Horizon*, 453: 22-24.

- 趙建民、張執中，2005，〈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 (2)：299-341。Chao, Chien-min, and Chih-chung Chang. 2005. "Zuzhi neijuan yu lieningshi zhengdang de diaoshi yu bianqian: zhong guogongdang gean fenxi"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a Leninist Political Party: The Case of the CCP].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7(2): 299-341.
- 趙煥新，1999，〈中國電子商務知難而進〉，《人民日報》，3月28日。Zhao, Huan-xin. 1999. "Zhongguo dianzi shangwu zhinan erjin" [China's E-commerce is Advancing while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Renmin Ribao* (March 28).
- 趙磊、朱傳婕，2013，〈餘額寶遭遇「備案門」〉，http://paper.people.com.cn/zgjzk/html/2013-07/01/content_1263897.htm，查閱時間：2018/04/12。Zhao, Lei, and Chuanjie Zhu. 2013. "Yuebao zaoyu 'beianmen'" [Yu'e Bao Treasure Hits "Record Gate"].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8).
- 劉孟俊、鍾富國，2013，〈中國集團企業興起與其影響〉，《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 (3)：93-114。Liu, Meng-jun, and Fu-guo Zhong. 2013. "Zhongguo jituan qiye xingqi yu qi yingxiang." [The Emergency of Chinese Business Group and Their Impact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9 (3): 93-114.
- 劉賓，2018，〈以制度創新推動戰略新興經濟發展〉，《人民論壇》，2：76-77。Liu, Bin. 2018. "Yi zhidu chuangxin tuidong zhanlue xinxiing jingji fazhan" [Promoting Emerging Strategic Economy via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eople's Tribune*, 2:76-77.
- 慶勝春，2014，〈馬雲的新計畫：阿里巴巴要做中國的「國家企業」〉，http://china.cnr.cn/xwwgf/20141231/t20141231_517280085.shtml，查閱時間：2018/09/02。Qing, Sheng-chun. 2014. "Jack Ma de xinjihua: Alibaba yaozuo zhongguo de 'guojia qiye'" [Jack Ma's New Plan: Alibaba Wants to Be China's "National Enterprise"]. (Accessed on September 2, 2018).
- 蔣玉敏，2011，〈村鎮銀行風險管理現狀、問題與對策：以浙江長興聯合村鎮銀行為例〉，《浙江金融》，5：43-45。Jiang, Yu-min. 2011. "Cunzhen yinhang fengxian guanli xianzhuang, wenti yu duice: yi zhejiang zhangxing lianhe cunzhen yinhang wei li." [The Stat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isk Management in Villages and Towns Banks: Taking Zhejiang Changxing Union Villages Bank as an Example]. *Zhejiang Finance*, 5: 43-45.
- 盧凱旋，2003，〈湖南改革開放圖志〉，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Lu, Kai-xuan. 2003.

- Hunan gaige kaifang tuzhi*. [Record of Reform and Openness in Hunan].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 錢衛清，2004，《國有企業改革法律報告：第1卷》，北京：中信出版社。Qian, Weiqing. 2004. *Guoyou qiye gaige falu baogao: Vol. 1*. [The Report on the reform of law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Vol. 1].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環球網，2014，〈不是競爭是合作：阿里聯合銀行推無抵押信用貸款〉，<http://tech.huanqiu.com/internet/2014-07/5079475.html>，查閱時間：2016/05/24。Huanqiu. 2014. “Bushì jìngzhēng shì hézuò Ali liánhè yínháng tuī wúdìyā xīnyòng dàikuan” [Not the Competition, but Cooperation, Alibaba cooperates with Banks to Launch the Unsecured Credit Loans]. (Accessed on May 24, 2016).
- Atherton, Andrew, and David Smallbone. 2013. “Promoting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t the Local Leve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31: 5-23.
-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Michael) Song. 2014.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ttps://cowle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conf/2014/ma_song.pdf (May 31, 2014).
- Booij, Mariëlle, and Padma Rao Sahib. 2012. “Slow But Certain: The Pre-M&A Process of European National Champion.” *Advanc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11: 55-68.
- Bremmer, Ian. 2008. “The Return of State Capitalism.” *Survival*, 50 (3): 55-64.
- Bremmer, Ian. 2010.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enguin.
- Breslin, Shaun. 2012. “Government-industry Relations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Art of the State.” In Andrew Walter and Xiaoke Zhang, eds., *East Asian Capitalism: Diversity, change, and contin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eslin, Shaun. June 2010. “Government-Industry Relations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Art of the State.” *CSGR Working Paper*, 272/10.
- Brink, Tobias ten. 2011. “Patterns of Distinct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Capitalism.” In Werner Pascha, Cornelia Storz, and Markus Taube, eds., *Institutional Variety in East Asia: Formal and Informal Patterns of Coordin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Dickson, Bruce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Mary E. 2015.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In Benjamin

- L. Liebman, and Curtis J. Milhaupt, eds.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orporated.
- Gough, Benjamin. 2014. "The 'National Champion' Approach to Postal Operator: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In Michael A Crew, and Timothy J Brennan, eds., *The Role of the Postal and Delivery Sector in a Digital Ag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Gu, Jing, Chuanhong Zhang, Alcides Vaz, and Langton Mukwereza. 2016.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Business in Chines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81:24-34.
- Hagel, John, and John Seely Brown. 2013.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art of a Deloitte Series on Innovation." <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topics/innovation/institutional-innovation.html> (March 12, 2013).
- Hall, Peter A. 2010. "History Institutionalism in Rationalist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and Kathleen Thelen. 2009.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7 (1): 7-34.
- Huang, Yasheng.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asheng.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pille, Joseph Henri, Walter Mattli, and Duncan Snidal. 2013.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Global Commer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ug, Barbara, and Hans Hendrichske. 2008. "Framing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Co-evolu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4 (1): 81-108.
- Kumar, Nirmalya, and Jan-Benedict E. M. Steenkamp. 2013. *Brand Breakout: How Emerging Market Brands Will Go Globa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6. "Friends with Benefits: How Political Connections Help to Sustain Private Enterprise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a Early View*, 31 (October): 1-37.
- Lambin, Jean-Jacques. 2014. *Rethinking the Market Economy: New Challenges, New Ideas, New Opportuni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i, Hongbin, Lingsheng Meng, Qian Wang, and Li-an Zhou.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7 (2): 283-299.
- Li, Xin and Kjeld Erik Brødsgaard. 2013. “SOE Reform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2): 54-78.
- Lin, Scott Y. 2017. “State Capitalism and Chinese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 (1): 106-138.
- Liou, Chihshian. 2013. “Dual Transition in Reformed China: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ase of Zhongguancun.”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 (1): 227-258.
-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tlin, Mikael. 2007.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New Approach to Ownership and Financial Control of Strategic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21.6319&rep=rep1&type=pdf>. (October 31, 2007).
- McNally, Christopher A. 2012. “Sino-Capitalism: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64 (4): 741-776.
- McNally, Christopher A. 2013. “How Emerging Forms of Capitalism Are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Asia Pacific Issues*, 107:1-8.
- Milhaupt, Curtis J., and Wentong Zheng. 2015. “Beyond Ownership: 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Firm.”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3: 665-722.
- Milhaupt, Curtis J., and Wentong Zheng. 2016. “Reform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Not Ownership.” In Benjamin L. Liebman, and Curtis J. Milhaupt, eds.,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sacchio, Aldo, and Sérgio G. Lazzarini. 2014. *Reinventing State Capitalism: Leviathan in Business, Brazil and Beyo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aughton, Barry.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 Nee, Victor, and Sonja Oppen. 2014.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jegomir, Vladimir, Jelena Demko Rinter, and Ivana Vrkati . 2014. “The Visible Hand of State in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Investment Funds.” In Aleksandar Markovi, Slaana Barjaktarovi Rakoev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XIV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ymorg 2014: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Madrid: FON.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arson, Margaret M. 2015. "State-Owned Business and Party-State Regulation in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In Barry Naughton, and Kellee S. Tsai, eds.,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Busines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ffaelli, Ryan, and Mary Ann Glynn. 2015.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Novel, Useful, and Legitimate." In Christina E. Shalley, Michael A. Hitt, and Jing Zhou,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ttan, Vernon W., and Yujiro Hayami. 1984. "Toward a Theory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00*,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Sauvant, Karl P., Persephone Economou, Ksenia Gal, Shawn Lim, and Witold P. Wilinski. 2014. "Trends in FDI, Home Country Measures and Competitive Neutrality." In Andrea Bjorklund,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Policy 2012~20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ofield, Norman. 1985. "Anarchy,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A Review."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 207-219.
- Sweeney, Paul D., and Dean B. McFarlin. 2014.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Cultural Challenges*. Oxford: Routledge.
- Thatcher, Mark. 2014. "From Old to New Industrial Policy via Economic Regulation." *Rivista Della Regolazione dei Mercati*, 2: 6-22.
- Thelen, Kathleen.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hanyi, Laszlo, Torben Pedersen, Timothy Devinney, and Elitsa Banalieva. 2015. *Emerging Economie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 Tsai, Kellee S. 2005.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9): 1130-1158.
- Tsai, Kellee S. 2006. "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59 (1006): 116-141.

- Tsai, Kellee S. and Xiaoxiao Shen. 2016. "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 in China: Local Developmental Models Under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World Development*, 87: 107-127.
- Vleck, Jenifer Van. 2015. "Who Needs National Champions?" <https://insights.som.yale.edu/insights/who-needs-national-champions>. (August 28, 2018).
- WIPO. 2015. "Telecoms Firms Lead WIPO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5/article_0004.html. (March 19, 2015).
- Yang, Yao. 2010. *Economic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ingapore: Gale Asia.
- Zehavi, Amos. 2012. "A Reform Less Ordinar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unctuated Equilibrium, and Mental Health Care Privatization."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44 (6):731-753.

